

首页 → 专题频道 → 口头传统研究 → 前沿话题

## 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

发布日期：2007-11-22 作者：户晓辉

【打印文章】

**【内容提要】**顾颉刚的进化历史观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主要来自胡适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解。在顾颉刚那里，中国传统的文献材料和历史演化的西方观念浑然天成般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在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标志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顾氏注目的中心是孟姜女故事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传说系统本身的演化规律及其真相，而这恰恰触及了故事和传说乃至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其研究方法的现代性特征之一。

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史上，顾颉刚无疑占据一个十分关键的位置。尽管他本人明确表示自己的兴趣中心在历史，他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只是服务于古史考辨的工作，但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做出的筚路蓝缕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就，足以使日本学者平冈武夫在1940年就断言，“即使说中国民俗学的研究是顾先生首创和培养起来的，恐怕也不过分。”（《古史辨自序·译者序言》）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历史时，不仅首先可以看到顾颉刚树起的一个不低的起点和标高，而且可以感觉到他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理念已经深刻地演变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并且继续影响着当代学者。所以，无论从学术史还是从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来说，顾颉刚都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个学术的“山峰”，更是我们在学术上继往开来和进行自我反思的一笔可贵的思想财富。本文拟选择孟姜女故事研究作为一个实例，探讨顾颉刚民间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来历和现代特征。之所以选择孟姜女故事研究，是因为顾氏的这项研究“开创了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的新道路，在这个领域中作出了划时代的卓越贡献，并取得了国际的声誉”。[1]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对中国现当代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2]

### 一、顾颉刚的方法论背景或学术渊源

讨论顾氏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不能不首先讨论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来源。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是在西方思想的启蒙与中国固有传统的磨合与碰撞中诞生的。在学科草创时期的重要人物中，顾颉刚与西方学术的直接接触似乎是最少的，所以至今仍然有学者认为顾氏的研究是所谓纯粹的“国学”。不错，顾颉刚学问的根基无疑是承续和发展了清代今文经学而来的考据之学。但是，我们似乎不应该忘记，20世纪中期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或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之所以牵扯到顾颉刚，恰恰是以承认顾氏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为前提的。只要我们仔细审视他的研究成果和一系列夫子自道式的文字，就不难看出，他的反封建的理性精神、批判的疑古态度、重视民众的观念以及将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纳入学术研究的气派，无不深受当时从西方传来的思想观念的熏染。他之所以能够把学术的是非标准从传统的“考信于六艺”变为“考信于理性”，并在清代学者的基础上为治学境界带来质的飞跃，除了受崔述、康有为等人的疑古思想影响外，无疑与他接受和理解的西方科学方法有极大关系。顾颉刚的学生刘起鈺指出，顾先生本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学到的西方科学方法主要有三项：

（1）归纳法，（2）假设的方法，（3）历史演进的方法。前二项是从大学逻辑（名学）课中学到的，后一项是从胡适那里学到的。[3]顾颉刚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说：

西方的科学传了进来，中国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对于治学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要把中国古今的学术整理清楚，认识它们的历史的价值。整理国故的呼声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我生当其项，亲炙他们的言论，又从学校的科学教育中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览而对于古今学术有些知晓，所以能够自觉地承受。[4]

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我屡次问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学方法到底有多少条基本信条？”静中温寻旧事，就现出二十年来所积下的几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十二三岁时，我曾买了几部动物植物的表解，觉得它们分别种类的清楚，举出特征和形象的细密，都是很可爱的。进了小学，读博物理化混合编纂的理科教科书，转嫌它的凌乱。时有友人肄业中学，在他那边见到中学的矿物学讲义，分别矿物的硬度十分明白，我虽想不出硬度的数目字是如何算出来的，但颇爱它的排列材料的齐整，就借来抄录了。进入中学，在化学堂上，知道要辨别一种

东西的原质，须用它种原质去试验它的反应，然后从各种不同的反应上去判定它。后来进了大学，读名学教科书，知道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又知道科学的基础完全建设于假设上，只要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日益演进，自可日益近真。后来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用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欢喜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作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如果傲慢地说，这些新主张也可以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了。但是我常常自己疑惑：科学方法是这般简单的吗？只消有几个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处应用的吗？在这种种疑问之下，我总没有作肯定的回答的自信力。因此，我很想得到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我真能用了科学方法去作研究而不仅仅是标榜一句空话。

[5]

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数十年里，胡适一直作为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的一个中介人物发挥着重要而持续的影响力。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顾胡二人的关系开始疏远，50年代对胡适的批判运动又使后来的顾颉刚在谈到自己受胡适的影响时多有保留，但是，作为在胡适耳提面命下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顾颉刚在学术思想和方法上所受胡适的影响却深刻而不容否认。

首先，顾氏的进化历史观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主要来自胡适对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解。早在19世纪末，进化观念就开始传入中国，当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主要在救亡图存方面，直到五四时期，对进化观念的介绍才集中在更新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从而引起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变化。除了在《古史辨一册自序》等文中的公开承认之外，1919年1月12日，顾颉刚在日记里记述了《新青年》上发表的胡适的一篇有关世界语的文章的评论：“胡先生评他根本论点，只是一个历史进化观念；并谓语言文字的问题，是不能脱离历史进化的观念可以讨论的。此意非常佩服。吾意无论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1月17日，他摘抄了胡适《周秦诸子进化论》“孔子好古”的一段话：“孔子虽不主张复古，却极好古。他的好古主义，全从他的进化论生出来。他把历史当作一条由简到繁不断的进化；所以非懂得古事，就不能真懂今世的事。……现在所以不能忘古，只缘现在的事情，受制于古代的原因的缘故。”并且在日记里说：“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6]在胡适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有重要的革命意义，因为在此之前，人们认为“物类”是不变的，到了达尔文才大胆宣言物种都有一个由来，都经过许多变化，而且进化论在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一种新的实证精神。他指出：“进化观念在哲学上的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7]胡适在钱别杜威的即席演说中说：“他（指杜威）的方法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历史的方法。我常说他是‘祖孙的方法’，就是对一桩事要查出它的来因去迹；来因的祖与去迹的孙，如有着落，那么，当中一代无论如何逃不了的了。这种方法用在消极的批评上，是最有利的。第二是试验的方法。这有三个要点：第一点注重具体的个别事实；第二是一切学说都只是假设，给我们参考用的，却不是天经地义；第三是一切学说制度等等，甚至真理都要经过实验。他不主张做古人的奴隶……”顾颉刚把这篇发表在1921年7月5日的《时事新报》上的演说抄录在笔记中，并加按语说：“此篇演说深契于余心。我以为欲救中国华而不实的毛病，只有杜威一派学说是对症药。”[8]

其次，顾氏对故事演变的兴趣也与胡适的推动和启发有关。他在1921年12月3日开始记的《景西杂记》说：

伯祥日记记适之先生昨日谈话云：

故事相传，只有几个motif（介泉译作主旨）作柱，流传久远，即微变其辞。若集拢来比较研究之，颇可看出纵的变痕与横的变痕。譬如此motif是明代发生的，其形容描写都用明代之习尚服装；传到清代，即改变为清代之习尚服装了。又如如此motif是江苏发生的，其形容描写都是当地的风尚；传到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处，又变成各该地的风尚了。所以motif不变，而演化出来，可以多方。如中国有“三愿”的祝告，无论小说、弹词、京腔、昆曲等都用，举必成三，各国亦均有之。又如佛经肇自印度，当地尊蛇，乃译成中国文字，即因中国人之崇拜，统易为龙矣。中国之龙王，固即印度传来者也。《西游记》一书，可以作者集合《华严经》善才访百口城，及玄奘、法显等求经种种motif而成者也。予拟搜集此纵横变易之材料。如秋胡戏妻，可自《列女传》起，至各代乐府，元曲，昆、京、秦各剧，比较观之。此等著名之故事不甚多，此事颇易为也。又如《蝴蝶梦》，亦可如此勘之。[9]

在故事研究的科学方法方面，顾颉刚常常把科学与理性联系在一起。出身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的顾颉刚，在当时感受最深而且在他的治学过程中最经常使用的就是“理性”。他的古史论文中，“理性”二字频频出现，例如，在《古史辨一册自序》中，他把“理性”与“迷信偶像”对举，强调用“理性”使“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自破”，他认为近代今文学家屈抑了自己的理性而做了汉儒的奴隶，他本人心中没有偶像，他佩服很多人的长处是因为“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愿把我的灵魂送去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他说自己之所以佩服胡适就是由于“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在胡适的影响和启发下，顾颉刚也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把科学升华为一种世界观和普遍的规范体系，科学的功能不仅仅是认识，而且是一种评价标准，也就是从单纯的知识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当时的科学被明确地被规定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被称为“科学的精神”，其基本要点是强调实证和尊重理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在传统的观念体系分崩离析之际，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试图把科学确立为一种高度统一的新的观念体系，他们主张“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胡适）并且对科学抱着几乎天真的信赖，[10]而一旦科学主要作为价值-信仰体系被推到时代的前台，它便超出了具体的实证与经验之域。启蒙的历史要求使科学被泛化并且由技（具体的经验知识）提升为道（普遍的世界观或价值-信仰体系）。所以当时的科学思潮虽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多数研究者对科学内在认知本性的忽视却限制了思想启蒙的深度。[11]顾颉刚处身于这个时代大潮之中，也难免这一局限。

请继续浏览：[1](#) [2](#) [3](#)

原文链接：[点击查看>>](#)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3年4期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www.iel.org.cn) (<http://www.iel.org.cn>)”。

#### 专题[理论与方法论](#)的相关文章

- 《MLA文体手册和学术出版指南》（第二版）
- 亟待正视的学术规范问题
- 把文学研究做厚做深做大做活
- 我是怎么“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
- 实践中传承 传承中保护 浅谈非物质文化遗产

#### 作者[户晓辉](#)的相关文章

- 发现“风景的发现”
- 启蒙现代性语境中的民俗学建构
- 论欧美现代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
- 从口头到书面：故事讲述中的人类学突破
- 民间文学：经世致用与自在自为

中国民族文学网



ᠴᠢᠩᠨᠠᠮᠤᠯᠠᠭᠤᠨᠯᠢᠷᠢᠨᠠᠨᠠᠭᠤᠨ

جوڭگو مىلله نلەر ئەدەبىياتى تورى

Curggoz Minzcuz Vwnzyoz Muengx